

主审◎徐
静

长征精神

与反贫困研究

洪名勇◎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主审◎徐
静

长征精神

与反贫困研究

洪名勇◎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征精神与反贫困研究/洪名勇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2

ISBN 978 - 7 - 5161 - 9775 - 2

I. ①长… II. ①洪… III. ①扶贫—研究—中国 IV. ①F124.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756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戴玉龙
责任校对 孙洪波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 75
插 页 2
字 数 339 千字
定 价 96.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2015年11月29日，国家有关部门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意味着，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从全国贫困人口分布看，在《决定》所讲的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中，贵州还有623万人，是农村贫困人口分布最多的地区。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6月16日至18日在贵州考察期间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讲话，2015年6月30日贵州大学长征文化研究院、省委党史研究室以专版形式就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为深入、系统学习研究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学校决定围绕“长征精神与反贫困问题”，设立校级重大专项进行研究。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我国贫困人口大量减少，贫困地区面貌显著好转，但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贵州如何反贫困？贵州扶贫情况如何不仅影响中国扶贫战略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而且还影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进行扶贫攻坚和反贫困，不仅需要调整扶贫战略，转变扶贫方式，由粗放式扶贫向精准式扶贫转变、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而且除进行项目、资金、物资的扶贫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精神上扶持。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讲的，扶贫更要扶志。“志”是什么？“志”就是志气，意愿，即心之所向，未表露出来的长远打算。“志”从何来？“志”的形成不仅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更需要一种精神来进行引领。扶贫攻坚，反贫困，2020年如期实现脱贫目标，不仅要在投入、体制机制、对象瞄准等方面下工夫，更需要有一种精气神。翻开历史，

我们发现：长征精神是一笔宝贵财富，是一种重要的、看不见的资源，对于今天的反贫困意义重大。2015年6月30日，贵州大学长征文化研究院、省委党史研究室以专版形式就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为深入、系统学习研究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决定围绕“长征精神与反贫困问题”，设立校级重大专项进行研究，以期扎实推进学校长征文化研究院这一重要科研平台的建设和发展。

洪名勇

2016年2月27日

目 录

专题一	遵义会议精神的科学内涵、价值和意义	1
一	遵义会议及遵义会议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	1
二	毛泽东与遵义会议和遵义会议精神	6
三	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视角和现实提炼	10
四	遵义会议精神的时代价值和现实弘扬	23
专题二	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	34
一	国内外研究概况	34
二	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	37
三	我国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精神缺失问题	40
四	长征精神对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	44
五	把握时代特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	51
专题三	长征精神的动态演化	55
一	长征精神的动态演化历程	56
二	长征精神动态演化的转变特点	68
三	“长征精神”动态演化的理论反思	70
四	长征精神动态演化的展望	77
专题四	长征精神对贵州反贫困的启示	81
一	新时期贵州反贫困的推进迫切需要 对精神贫困的深层破解	81
二	长征精神是破解贵州贫困地区精神贫困的有效法宝	86
三	弘扬长征精神,助推贵州反贫困事业	89

专题五	贵州反贫困过程中弘扬长征精神的经济学意义	101
一	长征精神内涵与文化资本	101
二	长征精神对反贫困影响的理论框架	109
三	基于长征精神与反贫困理论视角下的 贵州扶贫攻坚分析	120
专题六	长征精神与农民脱贫致富	140
一	长征精神及其对脱贫致富的内在追求	140
二	农民脱贫致富对长征精神的诉求	148
三	弘扬长征精神,促进农民脱贫致富	157
专题七	长征精神与扶贫瞄准机制	165
一	长征精神在扶贫瞄准工作中的价值选择	165
二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168
三	我国扶贫瞄准机制落实“实事求是”精神演变 与公共域变迁	174
四	精准扶贫新阶段落实“实事求是”精神的挑战与调整 ...	179
五	长征精神与创新社会化精准扶贫体制	182
六	反思:以长征精神推进精准扶贫机制改革	188
专题八	长征精神与反贫困过程中干部的责任担当研究	195
一	长征精神与反贫困过程中干部责任担当的内涵	196
二	长征精神与反贫困过程中干部责任担当的价值	203
三	长征精神与反贫困过程中干部责任担当的机制	208
专题九	长征精神与化解反贫困过程中“搭便车”问题 ——以路、水提供与维护为例	217
一	长征精神的经济学解读及相关文献研究	217
二	研究方案设计 & 实施说明	226
三	贫困地区公共物品“搭便车”现象与信任情况分析	228
四	贫困地区信任对路、水“搭便车”的影响	235

五 主要结论及研究启示	243
专题十 长征精神与贵州反贫困的路径研究	249
一 反贫困的几种典型视角	249
二 贵州反贫困事业需要长征精神	256
三 长征精神指导下贵州反贫困的“竞合”博弈模型	263
四 长征精神指导下构建贵州省反贫困合作治理模式	269
五 结语与展望	272
专题十一 长征精神与贵州革命老区整村反贫困实践	
典型案例	282
一 长征精神的基本内涵与贵州革命老区发展基本情况	282
二 长征精神激励下遵义县枫香镇花茂村反贫困实践的 调查分析	289
三 长征精神作用于贵州革命老区整村反贫困实践的 经验与启示	300
四 以长征精神为动力,推进贵州革命老区整村反贫困 实践的政策建议	312
五 结语与展望	318
专题十二 弘扬长征精神,利用红色资源,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新跨越	320
一 遵义革命老区娄山关镇、长征镇的红色文化资源	320
二 娄山关镇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327
三 长征镇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331
四 娄山关镇杉坪村“整村推进整体脱贫同步 小康创建”调研	335
五 长征镇城乡一体化和“组改居”调研	342
六 弘扬长征精神,利用红色资源,促进 地方经济发展新跨越	347
七 结论与展望	354

专题一 遵义会议精神的科学内涵、 价值和意义^①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6月16日视察贵州遵义时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他在其他讲话中也曾指出：“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关心贵州的贫困问题，嘱咐陪同视察的贵州各级领导要关心革命老区的建设和发展，做好发展和保护生态这两件大事，使贵州与全国同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制定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宏伟蓝图。贵州省委、省政府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也制定了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蓝图和奋斗目标，然而，贵州革命老区大多数是贫困山区，是贵州实现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要让贵州37个革命老区与全省发展同步，就必须深入挖掘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对促进贵州革命老区发展的精神价值，注入精神动力，创新发展模式，促进贵州革命老区与全省乃至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研究遵义会议精神的科学内涵及其时代价值和意义，在新常态下，大力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构筑贵州“精神高地”，助推贵州社会发展。

一 遵义会议及遵义会议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

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转战贵州时创立的。可以

^① 本专题执笔人：罗玉达。

说,没有长征,就没有遵义会议及其精神的诞生,而没有遵义会议及其精神,也就不会有红军长征的胜利,就不会有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将会改写,中国革命能不能胜利就成了大问题。因此,要深入研究遵义会议精神的科学内涵、价值和意义,就必须首先弄清楚红军为什么要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长征初期的苦难历程,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是怎样神奇地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实现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

(一) 红军为什么要进行长征?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了打破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在漫漫征程中,红军经受了人世间异乎寻常的苦难。自然环境造成的苦难不在话下,每天飞机大炮,几十万敌军围堵,缺衣少粮,武器简陋,还要战斗,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和藐视死亡的坚强信念,是很难坚持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异常艰难困苦的征途中,谱写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长征这一伟大壮丽的英雄史诗。那么,红军为什么要进行长征?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是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的直接原因。从现在发掘的史料考证,早在1931年,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就由留学苏联的王明、博古等人所把持,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统治,他们拒绝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在军事指挥上所创立的“游击战”、“运动战”,政治上实行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拒绝红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军事上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与强敌展开堡垒战、阵地战,政治上坚持“城市中心论”,强迫红军去攻打大城市,想在一夜之间实现苏联十月革命那样的城市暴动,夺取政权,迅速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错误地批判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志。这些行为致使中央苏区地盘逐渐缩小,红军指战员伤亡惨重。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直接导致中央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在被迫进行大转移的过程中才逐渐有了各种策略和目的。“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和英雄史诗,则是在红军长征结束后,重新回顾和认识评价这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岁月时,才被人们叫响的。红军长征的早期则只有失败和苦难,中期、后期虽然有了胜利的喜悦,但仍然充满着艰险、死亡和各种考验。

（二）长征初期的苦难历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后，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是秦邦宪（博古），军事指挥上取决于德国军事顾问李德，这个所谓的军事专家完全不了解敌军和我军的力量对比，只知把书本上学的军事知识硬搬到战场上，以堡垒战对堡垒战，阵地战对阵地战，完全不懂得弱军战胜强军要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及诱敌深入的道理，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严重失利，被迫转移。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它免遭打击，中共中央作出了痛苦的选择，离开苏区，向西转移，寻找新的生存地。可究竟在西部什么地方建立起新的根据地呢？如此重要的问题最初也只是一个模糊的设想。1934年9月17日，博古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绝密电报征求意见；30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①为了组织并指挥这次突围和西进，中共中央成立了“三人团”，据周恩来回忆，他“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李德房中，一次在中央局”。^②

红军突围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这一行动并没有被蒋介石发觉，等到蒋介石真正弄清楚红军去向时，已经是20天后的事了。但由于红军将所有坛坛罐罐都带上，行动迟缓，蒋介石才有时间调动部队在西、南这两个方向预设了四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封锁线，进入湘南嘉禾、临武。解放军档案馆现存的一份《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表明，中央红军出发时，共有8.6万人，3.3万支枪，平均每支枪还不到56发子弹，梭镖6000杆，马刀不到900把。这样的数据意味着长征中的红军士兵超过半数的人是赤手空拳的，而他们面对的却是装备精良、数量庞大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集结重兵，设置近150公里封锁线，试图将中央红军一举剿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14），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页。

灭。虽然红军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但在抢渡湘江时却遭受重击，损失惨重。正当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又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试图布下一个严密的“大口袋”歼灭中央红军；同时要各地方军阀势力分兵围歼中央红军。中央红军尽管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红军从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各种不良情绪在红军队伍中蔓延开来，博古也因此而试图自杀，面对鲜血染红的湘江，有人开始对未来红军的前途产生怀疑。

（三）“通道转兵”启生机

距湖南怀化200多公里有一个侗族自治县，原名叫“罗蒙”，在宋崇宁年间改名为“通道”。1934年12月10日，中央红军进入通道县境内。这支疲于奔命的红军部队，突破敌人多道封锁线来到这个湘、桂、黔三省交界的边陲小县，不管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某种巧合，就在这么一个小小县，通道，使中央红军开始摆脱厄运，开启了死而复生的大门。

当时，李德、博古等人不顾红军兵力损失惨重，对敌人夹击围歼之势置若罔闻，仍然坚持“左”倾冒险主义从通道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中央红军处在生死存亡的转折点。为了挽救红军、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找到红军生存发展的大道，已失去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不顾丢个人安危，开始了扭转和纠正错误军事指挥的系列活动，与中央政治局委员洛甫（张闻天）、王稼祥同志和红军高级将领多次讨论并交换意见，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利进行深入分析并寻找解决办法，一致指出通道北上湘西是十分危险的，对红军是十分不利的，甚至是致命的，力主向敌人统治薄弱的贵州进军。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渐得到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红军高级将领的支持。

1934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在湖南与贵州交界的通道县（今县溪镇）恭城书院召开了“通道会议”，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争论，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中央红军向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决定向西转入敌人统治薄弱的贵州山区，实现了中共党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通道转兵”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开启了中央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大道。

西进贵州，避实击虚，是当时红军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央纵队进入贵州境内后，军委命令在湘西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采取行动，调动并

牵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以策应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

“通道转兵”，对红军而言，的确自此步入了一条生机勃勃的通天大道。而一度被剥夺了党内、军内领导职务的毛泽东，也就此重新崛起，才有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转战贵州彪炳史册的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系列会议的胜利召开。

（四）遵义会议的科学界定和遵义会议精神的形成

遵义会议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17日，中国工农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城后，在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会议上，经过激烈的争论，明确了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毛泽东同志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许多研究者称之为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下，一切的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都是可以并且能够克服的。“遵义会议”由此闻名于世，正因为此，许多国人只知有“遵义”而不知有“贵州”。

近年来，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和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开始从广义上研究遵义会议，把遵义会议取得的成果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认为广义的遵义会议，是以1935年1月15—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标志的系列会议，包括1934年12月11日的“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1934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的“猴场会议”，1935年1月15—17日的“遵义会议”，1935年2月初（具体日子不可考）的“鸡鸣三省会议”，1935年2月5—9日的“扎西会议”，1935年3月10日、12日的“苟坝会议”，1935年5月12日的“会理会议”，1935年5月31日的“泸定会议”。广义的遵义会议强调的是事物发展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遵义会议精神实际上就是红军指战员在转战贵州途中所创立，在漫漫长征路中所不断发扬，在战争实践中面临生死存亡严峻考验而表现出来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所支撑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这一系列的会议都是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围绕如何摆脱国民

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就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而进行的。可以说“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召开，党和红军取得伟大转折的准备，“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泸定会议”则是巩固“遵义会议”成果，并在战争实践中，充分展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逐步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我们党从幼年的党走向成熟的党，红军指挥员和众多红军士兵在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指挥下，取得了人类战争史上“长征”胜利的奇迹。这需要强大的人类意志和精神力量才能办到的事，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军官兵做到了。这种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所支撑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又是与红军挺进贵州，强渡乌江，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回师遵义，佯攻贵阳，奔袭昆明，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突破腊子口等长征中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斗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

二 毛泽东与遵义会议和遵义会议精神

研究和传承遵义红色文化革命传统蕴涵的革命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遵义会议精神，这就必须要首先研究毛泽东与遵义会议和遵义会议精神的关系。

遵义会议在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现史上的重要意义和历史地位，党内外都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认定了遵义会议在中共党史上的伟大功绩。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红色文化的学者对“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的归纳和提炼已逐渐取得共识，党史界、学术界唯独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和提炼至今还处于热烈的讨论阶段，以至2015年1月15日在历史名城遵义举行的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大会上，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同志在讲话中，也只采用了“遵义会议革命传统”的提法。这是什么原因呢？有学者认为，用党的一次会议名称命名某种“精神”欠妥，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90多年的历史，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浴血奋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开的会议很多，如用某一会议的名称命名某种“精神”，那要做出很多“精神”的概括和提炼。一般地说，传达某次“会议精神”，是指该会议的意义、内容和现实指导作用等，照这样的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内容和作用乃至历史功绩和地位，早已有定论。遵义会议的会议精神早在红军转战贵州时期及之后的一段时期就已经传达到全党并坚决执行了，今天再来研究“遵义会议精神”似乎没有必要。近年来，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多数党史研究专家和研究红色文化的学者都认为，“遵义会议精神”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次会议的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实践，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井冈山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孕育时期，那么，广义的遵义会议时期则是毛泽东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形成和充分展示的开始，直到延安时期趋于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遵义会议精神”，就没有“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的诞生。毛泽东同志的才能在转战贵州特别是广义遵义会议期间的革命实践，逐渐为中共高层和广大指战员所承认和接受，从而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才从一个幼年的党成长为一个坚强的，能够领导红军，能够领导全中国人民进行英勇革命斗争，从而不断走向胜利，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政党。应该把“遵义会议精神”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起，视为中国革命精神传统，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今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有必要对“遵义会议精神”进行深入持久的研究，以利于保护和传承。

一个政党的成熟，有三个标志：一个成熟的纲领，一个成熟的理论，一个成熟的领袖集团。广义的遵义会议彰显出来的精神和实践，符合这三个标志。按照著名党史研究专家石仲泉的见解，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是由三个因素形成的。首先是“势”。“战争的大势将军事领导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谁能领导军队，谁就能发挥核心作用。”其次是“才”。“有了‘势’，没有那个本事、没有那个才能，同样不能成为核心。”再次是“场”。“这就是毛泽东的活动场所和工作环境。遵义会议改组过的中央政治局，跟博古主持中央政治局时的情况大

不一样。那时，毛泽东被排斥、受压抑、处于逆境，才能得不到发挥。遵义会议后完全变了，中央政治局的4个常委，能够发挥核心作用的就只有张闻天、周恩来和他（指毛泽东同志）三人了，而张、周都很尊重他。”^①毛泽东借这个“势”，有了这个发挥才能的“场”，才能扮演历史舞台的主角。笔者赞成石仲泉的见解。不过，笔者认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遵义会议最大的历史功绩是选对了人！遵义会议上当时最迫切要解决的是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过程中，因为选举了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成为常委，以后的局面就大为改观。中央红军三万余人，在前有重兵阻击，后有重兵追赶的万分危急时刻，要跳出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最高军事指挥层没有一位有着超人胆识、经天纬地才能的领袖人物，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王稼祥、张闻天两位同志才会接受毛泽东的见解，才会从我党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阵营中分化出来，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同志，才会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另外，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才能也是极其重要的条件，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一起创立的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朱毛”红军，在四面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却能站稳脚跟，形成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第一个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正确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国情和军阀混战的形势，认为只要红军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就有可能打败敌人的进剿，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形成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逐渐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这就是毛泽东著名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毛泽东和朱老总在井冈山斗争、第一次反“围剿”、第二次反“围剿”、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积累并概括的运动战、游击战、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理论和实践；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打土豪、分田地，注意做群众工作，建立根据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广大指战员和党的各级干部中早已深入人心。第三次“左”倾路线

^① 石仲泉：《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纪念遵义会议75周年》，成都春晓印务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335—336页。

占统治地位后，完全推翻了毛泽东和朱德在土地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和理论，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城市中心论，阵地战、堡垒对堡垒，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惨败，中央苏区完全丧失，被迫实行大转移，在转移途中，又不愿意放弃原定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处处被动挨打，导致许许多多的红军指战员血染疆场，无数人牺牲。在情况万分危急时刻，中共高层和广大指战员在革命战争的极端困境中思考：排挤毛泽东同志是不对的，没有毛泽东参加的军事指挥就要失败。这时，沉默许久的毛泽东出于对中国革命高度负责的大义，为了挽救在极端困境中的党和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开始与王稼祥、张闻天同志谈自己的主张，分析红军失败的原因，指出红军的前途和战略撤退方向，王稼祥、张闻天同志逐渐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通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现实，周恩来同志也在反思，开始站到毛泽东一边，才会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激烈争论和停止军事顾问李德指挥权的决定。在1935年1月15—17日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才会顺利进入中央最高层，当选为常委。又经过“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泸定会议”和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系列激战，毛泽东同志才逐渐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讲的那样：“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集体领导，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①毛泽东思想从广义的遵义会议起，再一次绽放出无限精神力量的光辉。红军在转战贵州的4个多月中，再一次显示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20世纪6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曾两次访问中国，拜访毛主席时竖起大拇指说到毛主席指挥的三大决战了不起！毛主席回答说，那不算什么，我一生中指挥过很多战争，最得意之笔是在贵州境内的“四渡赤水”之战。毛主席这样高度评价“四渡赤水”之战，笔者理解是因为当时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吧！当然也关系到他本人的政治军事生涯的生死存亡吧！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始了北上抗日、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纲领趋于成熟。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有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团的正确领导，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就有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0—343页。